



# 绝代称颂的国学大师 李审言

□黄 为



兴化自古人文荟萃,名流辈出,然而晚清以来,文章学问足以传世,久而弥芳,不可磨灭者,唯刘熙载与李审言二人。刘熙载学究天人,无所不通;李审言妙笔生花,独擅胜场。此俩人真是各有造就,自当并传不朽。钱基博先生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上编古文学之“骈文”一节,曾将刘师培与李审言合传,而其子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更将李审言与章太炎并举。李审言先生虽未亲接乡贤硕儒,然长养于斯风,承继乎斯学,所谓“仰止前修,蔚然后劲”(王利器《兴化李审言先生文集序》)。李审言除以骈文、选学名显当世,为时彦所推重之外,更是经史子集之书无所不窥,学问渊博的国学大师,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、藏书家,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。

李审言(1859-1931),名详,以字行,生于晚清。中年又字槐生,号枚叟,辉叟,江苏兴化人,著名文学家、学者。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孙。父李增曾任县主簿,为七品官,后因经商破产,陷入贫困。1876年被江苏学政王先谦取为第一名秀才。1907年,先生被聘为江楚官书编辑局总纂。1909年任《江苏通志》分纂。后来的《兴化县续志》也是在他编修成初稿的基础上完成的。1923年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。国民政府成立后,蔡元培任大学院长(后来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),1928年与陈垣、鲁迅、胡适等12人同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(相当于今之学部委员)。

李审言少年时代即聪颖好学,向人借书手抄阅读,熟背了《左传》和《昭明文选》。为生计所迫,17岁的李审言到盐城岗门镇表弟许葆生家做塾师,一面授徒糊口,一面刻苦自学。许家藏书较多,李审言教书之余,日夜攻读。尽读汲古阁所刻《十七史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文选》诸书。日尽十页,深夜辄绕案朗读。盛夏,庭中荷花盛开,李审言背诵《文选》中的名篇,绕荷花缸疾走,曾使阶石陷落,一时传为佳话。27岁的时候,李审言被学政黄体芳赏识,取为第一名秀才,后又受知于学界泰斗王先谦,岁科两试名列一等,补为廪贡生员,每月发给廪米,生活方稍稍安定。

清光绪十四年(1888)春节期间,王先谦在泰州书院给29岁的李审言写下了这样的批语:“生所注兼能搜讨古人文字从出之原,与鄙意符合,不专从征典用事,目光尤为远大。如能一意探求,俾成巨帙,允为不朽盛业。名世寿世,岂待他求哉。尝谓艰难困苦中方能造就人才,必境遇好而后为学,则杜老一生不能作诗矣。功名富贵,自有天命,惟当先谋自立之道。生有如此美才,若因饥驱辍学,岂不可惜。尚祈努力为之,以副厚望。”

30岁,李审言著《选学拾沈》一书,就《文

选》李善注本加以校改补正,并以此书稿就教于已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。王于首页批道:“所撰各条,并皆佳妙,无可誉议,但恨少耳。”(《选学拾沈·自序》)

清光绪十七年(1891),道台谢元福到各县巡视,出诗文题考查地方秀才,秀才们照例呈上观风诗,谢元福在观风诗中发现了才华横溢的李审言,就邀请他到署中担任书记。谢元福藏书400箱,交李详分部类编定目录,借此良机,使李详得以博览群书,学问益进。他着手研究扬州学派中坚汪中(字容甫)的文章,为作笺注。同事周左庵亦博学强识,向不轻易许人,一日谈论汪文,李审言说:“容甫《广陵对》中‘忠孝存焉’四字似无所本,实出自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注》。”周大为叹服,认为李审言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,学问渊博。一次,刘师培的叔父在扬州和李审言谈到汪中的《黄鹤楼铭》中的“桃花绿水,秋月春风”,李审言当即指出:“这两句话出自萧子显写的《南齐书》。”刘的叔父大吃一惊,说:“家兄(刘师培之父)校《南齐书》才知道注文这两句话的出处,还高兴了好几天,想不到你一问就说出来。”这两件事虽然小,但可见当时他的学问已博大精深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李审言省试未中,旋即蒯光典家中任家庭教师,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南京生活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蒯光典奉命出国任欧洲留学生监督,端方任两江总督,创办“江楚编译官书局”,缪荃孙任总纂,聘李详为帮总纂,直至光绪三十五年(1909)。名为书局,实际上无书可纂。端方收藏的书画和金石拓本很多,缪荃孙给他鉴定字画,李详与况周颐则分撰《陶斋藏石记》释文。况为人尖刻,专拈拓本无首尾或漫漶不辨字迹的给李详作释文题记,借以为难。但李详对金石学、史籍、小学精研有素,虽花费不少精力,但并没有被难住。晚年,他将《陶斋藏石记》中选了160余篇自撰释文集为一卷,并记始末于其上。

在南京这十年,是李审言学术上进一步成熟及从事创作的旺盛时期。与他交往的有长洲朱孔彰、江宁徐积余、江宁陈三立、贵池刘逊父、江宁陈作宁、江都梁公约等学者名流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邓实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月刊,以“保种、爱国、存学”为宗旨,刊载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文字训诂学等论著,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及图片,阐发学术传统,宣传反清思想。章太炎(当时笔名为章绉),刘师培(当时笔名为刘光汉)、陈去病、李详等皆为撰稿人。李详的学术著作《文心雕龙补注》、《臧记》(后改名为《愧生丛录》)、《颜氏家训补注》以及文学批评论著《论桐城派》等,皆在该学报上发表。其中《论桐城派》一文在民国成立后仍为一些报刊转载,经常被评论文章

所引用。桐城派起自方苞、姚鼐、刘大魁等,后经曾国藩、梅曾亮的宣扬附和,晚清吴伦伦、薛福成又互相标榜,蔚成风气。道光以后桐城派散文已成为当时古文的主流。李详的《论桐城派》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产生、发展及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:徒具形式,内容空疏;只讲起承转合及文言虚字的运用,摇曳作态,实质是八股文的变种。他认为林纾(字琴南)推崇桐城派,“将桐城派置之九天之上”,目的“不过为觅食计耳”(《致钱基博书》)。至于他自己的散文,自认为是受浙东学派的影响,为子部杂家之文,其主要特点是言之有物,在当时能自成一格。由于他在训诂、文学批评及散文、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,使他逐步为人们所了解,并得到学术界、文学界的推崇。

清宣统元年(1909)冯煦任安徽巡抚,沈曾植为布政使,仿照苏州成立创办“存古学堂”,选拔各县高材生百余人入学,以经史词章为教学内容,清宣统二年(1910)聘请李审言讲授史学及文学。民国二年(1913)“江苏通志局恢复,原安徽巡抚冯煦任总纂,聘李审言为协纂(相当于副主编),修订了《江苏通志》及一些县志。在校刊古籍方面,以校刻《章氏遗书》(清代著名学家章学诚的全部著作)对学术界贡献最大。此书经李详与孙德谦校订,遂成完本,是研究浙东史学和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极宝贵的资料。再如明末清初史学家兴化人李清韵的《三垣笔记》,专记晚明史实,在清代只有抄本流传。李审言发现后在民国一年(1912)由《国粹学报》铅字排印为《国学汇刊》本,民国十二年(1923)又商诸吴兴刘承干重刻,《收入嘉业堂丛书》中,使之广为流传。

李审言服膺段玉裁的说法:“好书者多寿”,“好学者,以书卷自养,往往多寿。”他一生清贫,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73年。他学段玉裁,虽“老、病、贫三者兼之”,却深浸“不种砚田无乐事,不撑铁骨莫支贫”的境界,做出了非凡的业绩。于纂修地方志外,他留下了18种著作,被学人誉为“国学大师”。以笺注之学为多的这些著作,发明学问,可谓现代笺注精粹。笔记体裁的文学批评论著《愧生丛录》,乃晚清笔记之瑰宝,其故之渊藪。其骈文、散文,亦华夏经典文明之绚丽散绮也。李审言著作秉承考据学的传统,推崇任大椿、王孙,乾嘉学者嘉定钱大昕有《潜研集》、仪征阮元有《研经堂集》,李言把二人的文集经常放在身边翻阅,

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二研堂”,表示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以钱、阮二人为师。他以“孤贫郁起,横绝当世”的通儒汪中为宗,写出的是有清一代可为殿军的文字。钱基博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中推其骈文为当时第一,钱仲联在《五四以来旧体诗文集叙录》里则说他的文章“远溯中古以上”,与章炳麟、王闿运并垂不朽。无怪乎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他,李审言的文章值得绝代称颂。

1949年前,李审言的大部分著作一直未能出版。十年浩劫前,李审言之子李稚甫(字承祜)教授应文化部之邀将其17种著作手稿献给国家,由北京图书馆典藏,得以幸存。1989年,其子李稚甫将其文稿加以精心整理辑为《李审言文集》(上、下册)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,洋洋89万言,胡乔木先生为该书题签。

